大公報 Takungpao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日 星期三

文化人

## 傳統現代交織 創造香港奇迹

# 何佩然

# 暢談中西文化激盪

▲何佩然談香港的管理與法制，如數家珍 本報攝

▲何佩然認為，香港的現代歷史濃縮了中國城市現代化的發展進程 本報攝

**香港的近現代史充滿中西文化的激盪。鴉片戰爭後，隨着英國文化的登陸，中西文化在香港產生激烈碰撞。作為東西方文明碰撞的縮影，香港既捍衛和存續中國傳統文化，又迎拒與磨合西方現代文化，交織着不同文明的衝突與融合，亦造就了香港的奇迹。**

對於中西文化的「交響樂」，何佩然坦言存在不和諧的「雜音」。華人起初非常排斥洋人及西洋文化，其間還爆發過許多衝突，如罷工、抵制洋貨、反對殖民政府等。西方經濟、政治與外交的侵略性，成爲中西衝突的根源，而傳教士的努力，某種程度上磨合了中西文化之間的衝突。傳教士來到香港，興建學校、醫院，以及孤兒院、老人院等慈善機構，藉此宣揚其信仰價值，以達致傳教目的，西方文化亦逐漸爲華人社會所接受。

### 傳統風俗保存完好

何佩然特別強調慈善機構在香港華人觀念變遷中的重要作用。當時中西文化對生死觀念存在巨大衝突，華人非常抗拒西醫，認爲「解剖」讓人「死無全屍」。但通過東華三院以善行推廣文化的持續努力，以及社會服務的制度化與理性化，令香港華人逐漸接受西醫，在日常生活的一點一滴中，帶來生活習慣、社會觀念乃至價值理念的變遷，使香港人思想日益開放，現代的香港人也愈來愈願意接受新事物。

▲二〇〇六年何佩然（前排左五）帶領中文大學學生往四川考察

她說，直至二十世紀上半期，本地人已經開始接受西方生活方式，並改變原有的生活模式。比如「唐樓」，其實是混凝土的西洋房子。中國人的房子通常以青磚和木材建成，取材容易，卻不能建多層。但混凝土的房子可以建多層，這就解決了人口密集城市的居住問題，因而備受華人歡迎。「唐樓」的最大特色在於騎樓，不僅具有通風和採光作用，而且可以下面開舖、上面住人，富有實用價值，所以在戰前非常流行。西方文化正是由於便利生活而融入華人生活，香港人開始選擇適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創造自己喜歡的生活模式。現在的香港有較濃厚的西方文明味道，這與當年的融合是分不開的。

在汲取西方文化的同時，香港亦傳承了中國傳統文化。對此，何佩然指出，殖民者一開始便頒布條例，允許中國人繼續傳統的生活方式與風俗習慣。而華人要強調自己的身份，就必須保留過年、拜神等傳統風俗。國外的華人，比國內的中國人更加尊重傳統，主因就在於他們身處異地，身份認同必須通過傳統文化來表現。在香港亦然，我們要時刻提醒自己是中國人，將傳統文化世代傳承下去。而傳統文化在新界保存得尤爲完好，亦與當地居民捍衛自身權益有關。現在，許多年輕人對香港傳統文化感到好奇，自覺地搜集和整理有關歷史，將族譜電腦化，爲保留傳統文化創造了一定空間，這是很好的事情。

▲二〇〇六年一月法國巴黎第一大學歡迎香港中文大學代表團的晚宴上，右一為何佩然

談及香港現代化經驗對中國的作用，何佩然認爲，香港的現代歷史濃縮了中國城市現代化的發展進程；深圳、上海等後起城市的發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借鑒了香港的成功經驗與失敗教訓，例如香港對貪污、公共建設、教育、食品安全等問題的處理方法，爲中國內地解決類似問題提供了參考，具有一定的啓示作用。

### 成功經驗可供借鑒

她說，現在香港與內地都是以經濟爲重，因而面臨着一些相似的問題。殖民地時期，香港要發展經濟，必須協調諸多複雜問題，先是經歷清朝政府、國民政府、新中國成立，後有「兩岸問題」、「冷戰問題」，香港人既要關注英國政府的取態，又要重視中國政府的看法，還要兼顧各種關係。每當遇到困難，港英政府總是表現出較強的協調能力，在經濟、政治與社會的三角關係中，審時度勢選擇首要因素，更將社會訴求暨民生問題作爲政經發展的重要平衡元素，凸顯社會生活的實際需要，在客觀效果上，借助民意解決棘手難題，手法十分聰明。

何佩然推崇香港的管理與法制。她說，在開放的大趨勢下，世界快速向前發展，經濟增長的背後，必須配合一整套管理制度，而管理制度又必須有法制加以支持與配合。香港已經走過這一階段，中國正在經歷着同樣的階段，因此，香港在管理與法制方面的經驗對內地的發展就顯得愈發重要。隨着經濟的快速增長，必須建立好的管理制度，要保障個人權益，就不能再依靠人治，權益的基礎在於法制，政府、商人與民間關係的平衡，要由法制來調適。香港是法治社會，無論營商還是日常生活，都要受法律規管，這已經成爲既定的管理模式。法制作爲西方的管理經驗，在香港成功嘗試，在中國內地亦應行得通，這對中國未來的發展很關鍵，香港的經驗應有助於內地少走冤枉路。

### 慈善文化深入人心

提及她專長的慈善文化研究，何佩然更是如數家珍。她說，香港的慈善文化有機結合中國傳統道德修養與西方現代管理機制，形成理性管理系統和自覺文化氛圍，亦可資內地借鑒。對於比爾・蓋茨向中國富豪勸捐卻「無功而返」，何佩然直言與教育背景有關，而中國慈善機構的透明度不高，慈善事業未能予公衆以信心，亦是重要原因。

她以香港爲例，指港英政府在東華三院成立之初便頒布法令，要求提交年度財政報告，並以《徵信錄》形式向公衆公開善款的來源與去向。政府與民間配合，既給予支持，又不干涉內部管理，藉法制手段進行規管，並給予慈善家適當的榮譽。現在內地政府可以借鑒香港經驗，採取獎勵措施，鼓勵企業家將財富回饋社會，並對慈善機構進行妥善監控。對於賑災，決不能滿足於只是「急賑」，急就賑，不急就不賑，應當從急賑轉化爲定期服務，這有助於社會的平穩發展。香港的慈善文化不僅是薪火相傳的社會事業，而且是深入人心的核心價值，在香港，回饋社會是人生的重要責任，惟其如此，才孕育了勇於爲大愛犧牲奉獻的衆多義務工作者。

撰文 子忱 立恆

▼何佩然在辦公室留影
本報記者黃洋港攝

## 【何佩然簡歷】

**何佩然**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取得文學士學位。其後遊學法國，從事群體生平學及社會史研究，獲得法國巴黎大學碩士、博士學位。自一九九一年始任教於中大歷史系，致力香港及近代中國的社會經濟史研究，現為副教授。

何佩然對香港都市化與中國現代化等課題頗有心得，曾出版多種有關香港及近代中國的社會經濟史專著。曾任法國巴黎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研究顧問，並任法國巴黎索邦大學杜篷客座教授。

何佩然還擔任多項社會公職，包括古物諮詢委員會委員、市區重建局非執行董事、勞工及福利局香港太平洋戰爭紀念撫恤金顧問委員會成員、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博物館專家顧問等。

## 魚湯論學問

何佩然熱情好客，不時邀請學生作客。有一次，她爲學生煲魚湯，從早上八點一直煲到晚上八點，上午放各種魚，下午放各類菜，最後放奶油，其間不斷試味和調味，好似做實驗一樣。心思滿溢的魚湯贏得學生一致稱讚，被譽爲最好喝的湯。

對此，何佩然說，無論做什麼，要做得好一定需要時間。研究歷史亦然，好像煲湯一樣，要用心去與食物溝通，還要兼顧客人的口味，花時間不斷調整和補充。其實，飲食文化反映了社會的發展進程，體現了人與人之間的感情，以及個人與社會的關係。

## 叛逆學生選擇「另類」學術

何佩然作風新派，研究領域亦十分新銳，諸如量化史學、群體生平學、口述歷史等，無不予人耳目一新的感覺。對此，何佩然笑言自己比較反叛，才會做出「另類」的學術選擇。

大學時期，當時的歷史學以政治思想史爲主導，強調鑒古知今，但何佩然卻感覺歷史距離現實十分遙遠，不免陷入迷惘。她曾經以一個非正統人物作爲研究對象，旋即受到規勸，只有選擇具代表性的重要人物才是史學研究的正途。

留法期間，何佩然接觸到年鑒學派、群體生平學和困難史學等新派史學，學術眼界豁然開朗。西方史學家對人文精神與社會現實的關注，對平凡小人物乃至妓女、乞丐等弱勢群體的關注，令何佩然有所啓發，促使她對歷史研究重新定位，關注平凡人的歷史、活生生的歷史。有別於正統的香港史研究，由供水發展、道路建設到城市規劃、中西建築，何佩然不捨「點滴」，致力描繪與衆不同的香港社會風貌。而法國人以藝術家心態精雕細琢做研究的學風亦感染了何佩然，令她在講求效率的香港毅然放慢腳步，靜心鑽研城市發展、建築、慈善文化等研究領域，悉心發掘第一手資料，以時間和心力澆灌出美麗的學術花朵。

## 學者要為社會盡責

近年來，從市區重建到文化保育，本港社會對自身的歷史與文化空前珍視，瀰漫着濃厚的集體回憶氣息。在港人的「懷舊」潮中，何佩然欣逢其會，從未缺席：她出任古物諮詢委員會委員、香港市區重建局非執行董事、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博物館專家顧問等社會公職，並擔任報紙、電台、電視台時事評論員，就市民關注的社會議題積極發聲；她還爲「香港歷史系列」、「香港故事」、「百年解密」、「香港地產史話」等節目出鏡講解，對推廣香港歷史與文化可謂不遺餘力。

作爲學者，何佩然有着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文化使命感。她直言市區重建不應以經濟效益爲先決條件，但也坦言並非所有舊建築都要保留。對於保育和發展的關係，她認爲，要從歷史、文化的角度去考量和協調。她說，社會對某些敏感問題總是預設立場，這是非理性的。學者絕不應預設立場，應當扮演持平的民間意見提供者，將其研究經驗與人分享，爲政府決策和公衆取捨做參考，只有這樣，對社會發展才是好的。

【逢周三見報】下周三刊學者小思專訪
美術編輯：羅縈宇
責任編輯：王鉅科